

(美)阿妮达·陈 著

史继平 田晓菲 穆建新 译

# 毛主席的孩子们

红卫兵一代的成长与经历



渤海湾出版公司

(美) 阿妮达·陈 著

史继平 田晓菲 穆建新 译

# 毛主席的孩子们

红卫兵一代的成长与经历

渤海学出版公司

## 毛主席的孩子们

——红卫兵一代的成长和经历

〔美〕阿妮达·陈 著

史继平 田晓菲 穆建新 译

---

渤海湾出版公司出版

(天津市和平区新华路庆云里23号)

河北省滦县印刷厂印刷 中国青少年读物发行总公司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印张 2插页 186千字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20000

---

ISBN7—80561—001—0/D·2 定价：3.10元

6067/15

## 序

文化大革命是对现在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惜于种种原因，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很薄弱。南开大学政治文化研究中心将有计划地组织开展文化大革命学研究，并致力于与文革社会生活、文化、心态有关材料的挖掘、抢救和整理。为了了解海外学者的研究状况，我们还计划有选择、有针对性地翻译和介绍一批国外有关文革研究的著作。《毛主席的孩子们》就是政治文化研究中心组织翻译的第一本书。

《毛主席的孩子们》是近年来海外中国学研究的一部有影响的著作，是一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文革前后内心世界的书。译介此书的一个目的就是为国内有志于从事文革研究的人提供一些在方法、材料和认识上可资借鉴的东西。关于这本书的内容，我不想说得过多。导读式的序言无异于给人限定思维框架，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有对读者不信任之嫌。

关于文化大革命本身，我倒有一些想法，兹述如下：

一、文化大革命结束距今只十余年，而文革爆发到现在也不过二十二年，但这段历史却开始在人们心中淡化。经历过的人或因耻辱、或因负疚、或因厌恶而不愿旧事重提，年

轻的一代则由于没有亲历而对这段历史又很淡陌。两者结合起来有可能导致一种历史健忘症。当然仅仅忘记过去并没有什么可怕的，但可怕的是一旦我们真地遗忘掉了这段历史，那么会不会出现历史的重演呢？“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一句由我们民族智慧结晶而成的古老格言不是已经告诉我们一些答案了吗？反思过去，是为了有一个更好的现在与将来，记住、思索、分析这段历史是我们抵制类似悲剧重演的一件得心应手的武器，有助于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

二、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主要是从是非功过方面进行判断的。但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把否定变成简单的遗弃。文化大革命绝非离开中国历史轨道之外的怪物，它恰恰是中国历史浓缩的再现，是历史上存在过的各种主义与当时追求的社会主义等诸种因素的奇特结合。文革中所表现出来的丑恶、残暴、麻木、疯狂以及对理想的追求，种种现象，大都可以从漫长的中国历史中找出原型。文化大革命无疑是领导者错误发动的运动，但进一步观察与思考，又不能否认，它也是被发动起来的人们的一次相当自觉的运动，以至出现了被忠干的主体无法或难于驾驭效忠者的现象。历史的事实驱使我们需要从更深的层次去理解文化大革命现象。

三、有人说文化大革命其实是革文化的命，这自然是不错的，但换一个角度看，它又是一次由一定的文化支撑的运动。现在有一些人把文革视为权力斗争，这样就很容易把思维限制在一个狭窄的框子里。其实底层社会所表演的一幕幕活剧，是更值得重视的，是整个社会文化与心态的大暴露。权力斗争问题固然需要研究，但社会文化与心态的研究目前

看更是刻不容缓的，应加紧进行材料的搜集与研究，因为这些很容易随着一代人的自然消失而给后人留下空白，向下一代传白卷是莫大的过失。

四、研究文革从政治文化方面进行考察是不可或缺的。政治文化有两方面，即政治文化化与文化政治化，前者表明，一定的政治体制通过有效的政治社会化手段可以内化而成为共同体成员的政治文化观念；后者则表明，政治运行无法离开特定的文化背景，并受到文化因素的制约与改造。从这一点出发来看文革，不难看出，政治与文化的交互作用、相互制约，在整个文革过程中表现得异常突出。《毛主席的孩子们》按作者的观点叙述了一个完整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不足之处在于，作者对于文化的政治化，亦即文化因素对政治过程的影响，显然注意得不多，从而给人以隔断历史的感覺。

《毛主席的孩子们》即将付梓，编辑和译者约我写几句话，借此呼吁几句，开展文革社会生活与文化、心态的研究，权以为序。

刘泽华

于南开大学政治文化研究中心

1988年11月10日

# 目 录

第一章 导言 .....	( 1 )
1、研究方法与实际调查 .....	( 3 )
2、政治积极性——积极分子 .....	( 8 )
第二章 小学的政治教育与性格构成 .....	( 11 )
3、党的教育与杜威主义 .....	( 15 )
4、政治教育的组织 .....	( 19 )
5、区：顺从的儿童积极分子 .....	( 23 )
6、白：有纯正癖的儿童积极分子 .....	( 39 )
7、张：反抗的儿童积极分子 .....	( 49 )
8、邓：讲求实际的儿童积极分子 .....	( 53 )
第三章 青春期的政治社会化 .....	( 66 )
9、小组 .....	( 67 )
10、阶级教育 .....	( 70 )
11、共产主义青年团 .....	( 71 )
12、模范教育 .....	( 76 )
13、英雄人物与死亡主题 .....	( 84 )
14、英雄人物与个人主义 .....	( 87 )
15、区：顺从的青少年积极分子 .....	( 89 )
16、白：有纯正癖的青少年积极分子 .....	( 102 )

17、张：叛逆的青少年积极分子 .....	( 125 )
18、邓：抱有实用观点的青少年积极分子 .....	( 139 )
19、阶级阵营和统一性的加强 .....	( 149 )
第四章 文化大革命：政治积极性的一次检验 .....	( 159 )
20、第一阶段：正统化的运动 .....	( 160 )
21、第二阶段：自由化的运动 .....	( 176 )
22、造反派的信条 .....	( 182 )
23、脱离毛泽东主义的规范 .....	( 185 )
24、张：文革中的造反派积极分子 .....	( 193 )
25、邓：文革中的务实派积极分子 .....	( 201 )
26、白：文革中有纯正癖的积极分子 .....	( 208 )
27、区：文革中的驯服的积极分子 .....	( 220 )
28、自我欺骗 .....	( 232 )
第五章 非政治社会化：文化大革命的后果 .....	( 235 )
29、非政治社会化 .....	( 239 )
30、张 .....	( 242 )
31、邓 .....	( 246 )
32、白 .....	( 249 )
33、区 .....	( 252 )
第六章 中国的政治社会化与权威人格 .....	( 257 )
34、权威人格 .....	( 257 )
35、中国人的行为与权威人格 .....	( 261 )
36、政治社会化的不同结果 .....	( 265 )
37、权威主义与非社会化 .....	( 278 )
38、新一代 .....	( 279 )
译者后记 .....	( 281 )



## 第一章 导言

“我一直坚持不懈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所以，睡觉时我经常先让别人选好地方睡，我还经常为他们打水喝。我是想以此来表明我的心是好的。我这么做是那么自然。我曾经做过多年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指导，我向雷锋、王杰、白求恩、张思德这些革命典型学习。我学他们是一心一意的，并照他们的事迹去做，让毛泽东思想影响我的行动。毛泽东思想我是活学活用的。”

当六、七十年代在中国的报纸广播中见到这样的表白时，禁不住要引起人们的怀疑。这一种热情，看起来是那么装模作样、渲染过度，令人难以置信。而且，它还很容易被人们当作笨拙的，人为的宣传而搁置脑后。

可是，这段引语并非来自任何一份官方的出版物，它来自1975年在香港我同一位年轻女士的谈话录音——带着嘲弄的口气叙述她在一家中国监狱里的行为。我的所有访谈对象都是做过红卫兵的那一代人，和这位年轻女士一样，他们中

绝大多数人对毛泽东主义的献身行为，可以见诸其从小到大成长的全过程。

这种献身行为在那时的中国被看作是“政治积极”。本书将探讨下列问题：如何以及为什么一些中国城市青年会成为充满热情的积极分子？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会有那么多人成为狂热的红卫兵？为什么这些红卫兵在同样保卫毛主席的旗帜下却分帮结派，互相攻斗？

此项研究还将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成长起来的这第一代进行一些探讨。当然也许其中的一些结论会引起读者的争议。在我的研究过程中，我逐渐地，却又是顺理成章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这些年轻的访谈对象，在不同程度上都带有法兰克福学派称之为“权威人格”<sup>\*</sup>的某些性格特征。

可以进一步观察到，这些年轻人身上所共有的权威信仰和情感需求，与其说来自他们父母的影响，不如说是在学校里政治社会化的结果。在这些年青人中，谁对毛泽东主义的信条最努力奉行，谁就会被官方称作积极分子；而那些较少献身，也较少政治上成功的同学相比，他会发展成更高层次的权威人格。

当然，我并不是说，是学校当局或共产党领导有意识地把象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表现的狂热信仰这样的权威人格极端形式灌输到孩子们心中。党的教育工作者所做的只是竭力鼓励那种与毛主席的教导相一致的高标准的道德和守纪律

\* 权威人格：崇拜权威并屈从权威，但与此同时又希望自己本身成为权威，而且要求别人屈从他自己。参见第五章。——译者注

的行为。不难看到，正是通过这套体系，这些教导很快就形成了影响：个人献身行为成了竞争的内容，对于政治正统的夸大需求被灌输到孩子们的心中，而对于被排斥对象的强烈歧视却受到了鼓励。我将提出证明，在六十年代城市中学里，“权威人格”已经成为这些毛主席的孩子们的居支配地位的社会性格，——在文化大革命中，正是它导致了毁灭性的后果。

还可以看到，那些曾经形成的性格特征，也并非就必然是持久固定的。作为文化大革命斗争后果的感情破灭，使这些同样年岁的成年人中出现了非政治社会化（political desocialization）现象。随着同辈集团约束的解体和其意识形态信仰直接导向怀疑，他们对权威社会角色的顺从也就消失了。

在拿出影响红卫兵一代政治社会化的材料之前，我并不想在权威人格及其影响这一题目上做过多的论述。本书的最后一章将把全部材料上升为理论上的考察，藉此读者将能够自己评定我的结论正确与否。

## 1、研究方法 with 实例调查

推动我进行此项研究的是1971年在香港我与一小群来自大陆的年轻人的几次短暂谈话。我自己是广东人，在中国海岸边的英国殖民地长大，来自广东的红卫兵和香港人之间的巨大差别震动了我。他们所操的广东话的语调与我们并没有多

大的差别，但他们讲话的内容，却使我们大惑不解。他们使用着与我们完全不同的辞汇，在这些辞汇背后有着不同的词义和内涵，以及不同的生活经历和世界观。正是这使他们与我们有所区别，也就是这些不同之处，引起了我的兴趣。

1974年，我回到香港进行我的博士学位研究。通过我三年前认识的那几位前红卫兵，我和他们的朋友，以及他们朋友的朋友建立了联系。由于这些人是通过私人介绍认识的，当我们初次见面时，就出现了互相试探的现象。他们在考虑我是谁？我研究的领域是什么？以及为什么我想要认识他们？同样，我也想知道他们是谁？他们的背景怎样？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有何作为？以及他们现在的情况。我开始与他们频繁接触，有时是一对一的，有时是许多人在一起。逐渐地，或单独，或三三两两，他们中大部分人开始非正式地跟我学英语。通过这种私人教授的方式，十四人中有十一人，我与之进行了深入的谈话。我喜欢这种安排，因为这能够使我心安理得地要求和他们进行正式的、广泛的交谈，并且不至于使他们陷入“付钱的谈话者”那样的窘境。在他们那一方，他们也欢喜有一两个朋友可以吐露心曲。有几位还急切地谈到了更多的内容，诸如他们个人生活经历以外的事，以及他们最了解的关于中国的情况等。到1976年访谈结束时，他们之中有好几位已经成了我最好的朋友。

对于十四个人中的每一位，我主要运用开放性问题的提问方式，与他们进行了广泛的交谈。我鼓励我的访谈对象离题去讲他们自己的生活轶事和自己的话题。每一次谈话大约持续二到三小时，平均与每一位访谈对象都有八到十次谈

话。所有这些都录了音，逐字逐句地从广东话译成英语，并且誊抄下来。

此外更多的时间是在饭馆、他们的家和我的家中渡过的。聊天、扯东拉西，或者讨论问题。这样做有很大的好处，因为尽管在谈话中当他们暴露内心情感时有些不安和窘迫，但我们之间的亲密程度减轻了这种困难。有时他们的文饰很容易看出，我可以通过他们的性格了解其内容；而且，事实上，对于一些特殊事情他们所表现出的窘态和反感反而为我的分析提供了更多的素材。

这些年轻人中大多数碰巧在两个方面具有共同性。其一，他们中大多数都有由官方确认的相似的阶级成份。此阶级成份指的是其家庭中的户主在1949年解放前所占有的社会地位。这些情况保存在政府档案内，后代的成份根据父亲的传递来确定。根据官方的说法，出身好的人（解放前是工人、农民或共产党员）理所当然会带有更革命的态度，而那些阶级背景不好的人（出身于解放前的资本家、地主、富农或国民党家庭）一般都带有不可靠的政治态度。他们相信这种态度是可以传递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老子传递到儿子身上。

对我的访谈对象们来说，阶级成份的划定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由于政治身份的确定表明了新政府对他们的看法，所以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他们在学校中的地位以及提高地位的机会，而且，它还影响着青年人对自身的看法。

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人被划归到小资产阶级里，即一般

成份，这包括解放前的文人学士家庭和小商小贩家庭。在我的访谈对象中，大部分都属于小资产阶级中的“知识分子”出身。这意味着他们的父母在解放前属于象西方的“白领工人”那样的社会集团，它包括从专家到教师、职员各类专门人才。

这些家庭的政治身份并不明确。写于1926年的毛泽东的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曾经把小资产阶级称为潜在的革命力量，可以分为右派、中派和左派。

“小资产阶级的三部分，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平时各不相同；但到战时，即到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参加革命，中派亦可参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和着革命。”

以此为据，革命后小资产阶级被认作是动摇分子，或者是支持革命的左派，或者是一定时间内隐藏在无产阶级阵营中的右派。这样，小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就如同被设了陷阱。1950年以后，他们就是处在这样一个尴尬的位置上，忽而是可以信赖的，忽而又不可信赖。如同其父母一样，在学校里他们的孩子也是走在钢丝上。

事实上，绝大部分我的访谈对象的父母都属于小资产阶级的中派或左派。四十年代他们支持共产党，反对腐败无能的国民党。他们也是爱国的，事实上，尽管在刚解放时他们是能够自由地离开广东去香港的，但他们中的不少人是经过

选择后而留在大陆的。看到数十年战乱后满目疮痍的祖国，他们是准备献身于国家建设，尤其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因为他们确信中国需要他们的专门技术和教育。在以后各章可以看到，正是这一点通过非常特殊的方式影响了他们子女的态度。

前面讲了我的访谈对象的第一个共同点是具有相同的中产阶级背景，那么第二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充当的角色。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投入到这场剧变之中，而且其中有两位还是广东的初中红卫兵领袖。正是他们作为红卫兵的积极性与态度，使我发现了在政治积极性与权威人格之间的关系。

我所感兴趣的是他们在中国成长的一般状态，作为青少年，这些年轻人曾经有着坚定的信仰。读者自己将会很快发现，他们是如何献身的，事实上，这种献身也就是对党的信条的献身。无疑，正是这种献身精神的强烈性，以及对于任何异端信仰的顽固排斥，构成了此项研究的主题。

我的访谈调查实例的选择仍然带有强烈的先入为主的观念，——我们已经看到，它只集中于同一类型阶级身份的青年。但是，如果在分析中注意到了这一点，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也未必就会使研究和结论失败。通过访谈对象的集体回忆，有可能得到一个对于城市中等阶层年轻人状况的看法。我相信，通过这一集团的周围环境，我们能够对于中国社会整体作出某种系统的概括。例如，肯尼斯·肯尼斯顿（Kenneth Keniston）的《年轻的激进主义者，对美国蛮干青年的几点说明》一书就表现了与其主题并列的六十年代

美国的非蛮干青年。又例如奥斯卡·列维斯(Oscar Lewis)的《桑切斯的孩子们》一书，它把目光集中于贫民区的生活，但在叙述之中也告诉我们了一些关于贫困，关于墨西哥的更概括的东西。同样，本书也将为您提供对于中国其他类型青年的更深入的理解。

## 2、政治积极性——积极分子

此项研究的对象是年轻的积极分子，也就是说，是对那些积极献身的人的研究。应当指出，“积极分子”这个词只有放到中国政治系统的环境中才能理解。

真正的积极分子一开始就被认为是党的教导的笃信者。这些教导被认为能为他们提供一种依托，一个终极的目标。其信念的中心部分是这样的：通过在大众中对这种信仰的广泛传布，中国能够重建一个繁荣的和政治上纯洁的社会。积极分子的热情可以做为鼓动群众的催化剂，他们被看作是在掌握真理的上层和真理推行对象的大众之间的一个重要桥梁。他们不仅在运动中要起到发动和组织群众参与的作用，就是在平时，也要致力于“发掘”群众的热情。

与列宁主义信仰一致，他们认为只有有纪律的组织才能推动历史前进。也只有通过组织成员的积极行动，其贡献才是真实有效的。这样，积极分子就被吸收到共产党中，如果他太年轻，那么就由共青团接纳他。为了换得成为真正的“革命先锋”的机会，他们能够毫不动摇地服从组织的需要。作为



组织成员，他们的责任加强了，但却可以从中获得感情上的慰藉和依托。

当问到这些以前的积极分子关于积极性以及积极分子组织时，他们经常提到“光荣”这个词。这个词本身就暗示出其既表示精神上的成就，也意味着个人的声望。这就是问题的两难之处。积极性可以带来社会地位和局部的名望，而且甚至有时还能带来个人提升的机会和物质上的利益。毫无疑问，后者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虔诚的积极分子所企望获得的。他们要坚持不懈，反反复复地锻炼自己，以与一己之私欲进行斗争。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完整地保持自己的正义和献身精神，并且使自己成为普通群众的榜样。

问题就在于，一个成功的积极分子所获得的种种好处，对那些有野心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诱惑。他们追着潮流，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表现出积极、献身的样子。这样的人，也就是那些不具有真正积极分子信念的人被称为“假积极”。有些中国人认为他们所认识的大多数积极分子事实上都是骗人的投机分子。当时中国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正是这种现象的反映。由于获得了可观的报酬，那些“真积极”的积极分子所面临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才能表明他所公开表现的对于积极分子行为准则的献身，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做样子给人看的。

在我的十四位访谈对象中，有十一人声称在他们生活中的某一阶段曾经真正地按照对积极分子的要求去做过。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十一人中有八人，从来也没有成功地获得过任何好处或权力。在本书中，这几位访谈对象可以划